

跨越

东西方的思考

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李雪涛

柳若梅 编

顾 钧

跨越

东西方的思考

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李雪涛

柳若梅 编

顾 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东西方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 李雪涛等编.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00-9284-3

I. ①跨… II. ①李…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015170 号

出 版 人：于春迟
责任编辑：李旭洁
封面设计：覃一彪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
印 刷：北京市国工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8.5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0-9284-3
定 价：38.90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物料号：192840001

在五洲四海间书写中国学术

这个文集实际上是为了庆祝张西平教授六十华诞，我们几个作为后学的他的同事组织编辑的。文集的四大组成部分，亦即“海外汉学与汉学家研究”、“传教士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汉语教育史”以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也是西平教授在近二十年间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四个领域。其中，世界汉语教育史这一学科，是他首先提出，并率先于2004年7月在澳门注册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

一

尽管中国境内的海外汉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和民国阶段，不过有意识、自觉地对国别汉学史进行梳理，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近三十年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严绍璦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在‘国际中国学’的研究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和相当的经验，我国人文学者不仅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在不同的层面上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一极为丰厚的国际学术资源，而且以我们自身的智慧对广泛的国际研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纵观这三十年来的发展，在海外汉学的研究方面，我们已经从单纯的翻译发展到翻译与研究并重的局面，并打破了单一的英语模式，日、法、德等非英语国际汉学著作的翻译，也预示着海外汉学在朝着多元态势发展。作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严先生指出，应当关注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文化语境：一是还原其历史和文化史的背景。因为日本中国学显然是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构筑起的“国民文化”的一种表述形态，它首先是“日本文化”的一种类型。二是关心更宽阔的世界性视野。目的是将日本中国学研究，放置于相关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中予以考察，从

而更加确切地把握运用日本中国学的资源价值。严先生同时还指出了中国学研究文本的“原典性”观念，认为要作海外中国学研究，那么就必须使用中国学家的原著来进行，对使用译本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顾彬（Wolfgang Kubin）先生以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译本为例进而指出，重印的典籍甚至都不可靠：“所以说，在进行任何批评之前，花时间去寻找其原作是很必要的。”我以为，以上严先生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方法的阐述，是我们进一步作研究的理论基础。

任大援先生的文章对三十年来海外汉学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除了对“法国汉学研究”、“传教士汉学研究”和“域外汉籍与汉学文献的相关研究”三个知识论领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之外，还从实例出发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在从事海外汉学研究时所应具备的立场和方法：一是中国学术的立场，二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方法。我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立场和方法，才能将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学术史有机地结合起来。

清代学者李惺（1787—1864）曰：“师以质疑，友以析疑。”在课堂上我一直向学生们强调问题意识，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是进入一切学科的前提。顾彬先生则通过对他的前辈汉学家卫礼贤的检讨，提出了八个颇令人思考的论点。总结起来包括：一、对赛义德东方主义在汉学研究运用上的批判，提出汉学意味着异国情调的终结的论断（论点1、2、3、4）；二、中西互补的观念，认为“中国的历史编纂也许要非中国历史学家来完善”（论点5）；三、诠释学的观念，认为“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另外一种看法，就像卫礼贤所代表的那样，从来不是永恒不变的，而仅仅是一种需要不断重新探讨的可能看法”（论点5、6、8）；四、历史语境的还原，“如果没有足够的近代世界文学知识，也就无法理解卫礼贤及其对中国的接受，更谈

不上理解他在当时以及今天的影响”(论点7)。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顾彬先生有关卫礼贤的八个论点实际上提出了新时代汉学研究的理论架构。

刘正先生以扎实的一手材料从四个方面对日本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进行了研究,历数了内藤的重要学说,钩沉了与当时中国学界学者之间的交往,并对内藤学说在世界上的影响作了分析,认为“内藤湖南博士以宋代为近世说的出现,最大限度启发了中古史权威陈寅恪先生对隋唐政治制度的研究。……他的隋唐一体和对宋代学术的寄托,他的以种族文化来代替贵族论的立场,都可以看出聪明的陈寅恪先生对内藤假说的赞同和发展”。朱政惠先生则以自己与美国中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的交往为基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柯文的王韬研究及其“中国中心观”的形成,指出海外汉学研究应当注重“研究者的个人素质与方法、研究者所面临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研究者的学术渊源”的问题。李雪涛则通过对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对中国佛教史和基督教史的研究,对这位东亚宗教史家半个世纪以来的汉学研究理路进行了探讨,指出,许理和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适应以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设法弄清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反应及其适应过程。并进而认为,“适应的政策”(Accommodation)和“文化上的命令”(cultural imperative)可以说是许理和在中国宗教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两个中心概念。

二

传教士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是西平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的领域,在海外汉学中心成立八周年的时候,他就曾将中心几年来的学术传统概括为三点:第一,以历史为基本线索,梳理中国文化外传的历史、途径和机制。第二,以基督宗教为中心,重点研究在“西学东渐”基础上的传教士汉学,奠定研究西

方汉学的根基。第三，推动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并以比较文学、文化的方法对海外汉学作系统的学术史研究，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学术形成的外部机制，以世界的眼光重审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他将这三点概括为：“在历史中探中西会通，在神圣中究天人之际。”传教士汉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其本身是跟中国基督教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明清之际来中国的传教士既是中国学术的直接研究者，也是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最初传播者，正是他们推动和催生了西方汉学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西方学术和文化的视角来看，传教士汉学实际上是西方汉学的基石。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从“传教学研究”到“汉学研究”的转变是国外汉学家提出的，西平教授认为，这种所谓的“范式转换”跟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创者陈垣（1880—1971）先生一开始就关注所谓的“汉学问题”，即中国文人面对基督教时的反应以及接受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是接续上了这一传统。刘耘华先生以“从人脉关系入手来探析历史人物之思想与心态内蕴”的方法，在黄一农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徐光启的姻亲脉络与上海早期天主教传播的相互关联。在探讨了孙元化（1581—1632）、许乐善（生卒年未详，1571年进士）两个家族文人对天主教的信仰历程之后，他向我们展示了，天主教原本的教义已经逐渐被中国固有的文化血脉所消解。作为第三代的天主教徒，与置身于中西两种文化夹层的冲突张力之中的他们的祖辈相比，在这些人身上已经很少存在基督教教诫与儒家伦理之间的那种巨大的心理恐慌与冲突了。

作为科学史专家的石云里和吕凌峰两位先生，对明末和清初的日月交食的预报和观测数据进行了系统的精度分析。他们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现代理论值的计算发现，尽管当时西法推出的食甚和复圆时刻的误差明显大于《大统历》所推算的数值，但西法最终依然取胜的事实，并对其中的原因作了深

入的分析。两位作者指出，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天文学“只是钦天监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系统中实现其礼制和政治功能的一种实用工具，而没有变成一个以通过审慎的观测来探索天体运动规律为目标的知识分支”。因此，即便传教士在当时引进了哥白尼的日心理论，仍然未必能使中国天文学走上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之路！

张铠先生结合详实的中西文史料，对方济各会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的《在华迫害纪实（1664—1666）》（*Relacion de la Persecución en China, 1664—1666*）作了剖析。汤开建和刘清华先生的文章，对康熙时期艾若瑟（Joseph-Antoine Provana）出使罗马的始末进行了考察，并着重分析了当时教廷管理中国教务的政策走向，葡萄牙政府与清廷及教廷三方之微妙关系，康熙对在华主教事业及传教士的态度以及西土的遭遇与体验等问题。金国平先生从中西文的史料出发，对清朝档案中耶稣会宫廷神父药方中的“格尔墨斯”与“阿尔格尔墨斯”进行了考辨。魏思齐（Zbigniew Wesołowski）神父以历史为线索，对西方与中国的相遇历史作了梳理，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中国天主教史的资料。钱婉约女士以晚明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为出发点，探讨了明季中国人西学观的文化特点和意义。沈国威先生对 19 世纪末翻译《时务报》的日本学者古城贞吉（1865—1949）的生平及《时务报》的“东文报译”翻译地点进行了考释，揭示了这份由黄遵宪、梁启超等创立的旬刊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多年来一直从事徐州耶稣会士研究的李晟文先生，在论文中对徐州的教会学校进行了探讨，同时对这些学校的教学活动和影响也作了分析。在传教士汉学研究中，传教士的中文藏书是当前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的文章，从 19 世纪中叶入华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斯卡奇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а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21—1883) 的中文藏书入手, 全面研究这位汉学家及其藏书的情况,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俄罗斯汉学与中国、欧洲汉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

三

如果将传教士汉学中的一些著作如《葡华辞典》、《西儒耳目资》、《华语官话语法》、《五车韵府》等从国际汉语教育史的角度加以把握的话, 那么这些正是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史和汉语教育史的内容, 换句话说, 早期汉学史也包含了今天称之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方面面。正是基于以上的视角转换, 使得西平教授开始关注“国际汉语教学史”这一领域, 并于 2003 年编著了《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年) 一书, 其中包括概论、个案研究、文献、目录四个部分, 为汉语教育史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内田庆市先生的文章从宏观的角度对近代西方人汉语研究史的状况和课题作了分析, 提出了在进行语言文化接触研究时必须考虑时代的背景这一根本问题。柳若梅女士以丰富的史料, 对 18 世纪在北京和俄罗斯的俄人汉语学习情况进行了梳理。朗宓榭 (Michael Lackner) 先生和徐艳女士对罗伯聃 (Robert Thom, 1807—1846) 的论述, 使我们认识到, 这位编纂《华英通用杂话》的汉学家, 既不是以往我们所认为的是所谓纯粹的殖民主义者, 也不是所谓中国人民的朋友。文章揭示了罗伯聃在各种角色替换中的不同新身份。顾钧先生则对作为美国汉学之父的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的四部汉语工具书作了介绍, 以实际的例子对每一部的特点作了分析。

四

诚如任大援先生所指出的, 从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来看, 比较文学领域是较早关注汉学的学科之一。比较文学与比

较文化的方法如文学文化间的对话、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翻译研究等，都能直接运用到海外汉学的研究上。并且在中国，比较文学是很早就有学科建制的专业，许多汉学人才都是由各大学的比较文学专业直接或间接培养出来的。因此，比较的理论与方法对海外汉学来讲一直都是其学术研究的有力支持。

作为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研究的资深专家，李文潮先生依据西文文献对莱布尼茨《中国自然神学论》（*Discours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的编者科尔托特（Christian Kortholt, 1709—1751）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原出了他的各种观点的出处。李先生在文末指出了莱布尼茨之所以能超越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地方：“以理性为导向，有选择地接受宋明理学中的某些论证与观点，同时说明了莱布尼茨与许多传教士在基督教神学方面的不同。莱布尼茨坚持的也许是一个启蒙运动初期的经过理性检验的神学观。这一立场使他能够接近宋儒的一些形而上学方面的论证，而在他看来，龙华民等人在中国代表的则是一些在欧洲流行的‘庸俗’的哲学与神学教条。应该说这一批评也适用于利玛窦所代表的大部分的神学观点。”

汉克杰（Heinrich Geiger）先生的论文让我们重温了大多数人早已忘却的哲学家李石岑（1892—1934）与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对哲学的理解。罗哲海（Heiner Roetz）先生则回忆了他的导师、原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华裔哲学教授张聪东（1931—2000）的生平，并对张先生在中国古典哲学方面的翻译和阐释作了介绍。特别强调了作为语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张聪东认为不能通过二手的研究文献，而必须经过直接分析中文原始资料来获得认识的研究方法。方旭东先生在文章中通过“仁”在各重要英译《论语》中不同的翻译和阐释，揭示出了译者对儒家这一重要概念的仁者见仁，并深入分析了各不同英译概念的西方哲学语境。

莫芝宜佳 (Monika Motsch) 女士的《杨绛和西方文化：探险—苦难中的安慰—转化》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论文。在文中，她以杨绛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和 80 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为例，探讨了在其作品中西方文化究竟扮演什么样角色的问题。她有理由地认为，杨绛在“回国之后，由于政治变化，从事西方文化研究成为巨大的危险和负担。但或许正是这一点才使她对西方文学作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堂吉珂德》与《斐多》中，杨绛重新发现了自我，而他们则陪伴她度过艰难的岁月。在晚年的作品中，那些原本‘陌生’的西方理念早已成为‘自己的想法’。它们与杨绛的中国经验和传统相结合，形成她个人特有的信念，是她本人富于创造和幻想的自我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像所有文化一样，打破了狭隘的国境。”我认为，如果没有很好的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素养，这样的比较研究是很难做得如此深入的。前些日子在校阅莫女士的《中国中短篇叙述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一书时，更加证实了我的这一想法。

海外汉学同时也包括华裔研究者的成就，上述张聪东是一例，魏崇新先生所研究的夏志清则是另一例。作为文学史专家的魏先生从“阐释杰作、以点带面”，“对史传、说书传统的清源溯流”，“批评立场：‘人的文学’观”以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阈”四个方面对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评价，实际上是两位文学史家间的对话。除了举隅对夏著的优点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之外，也指出了夏著在立场、观点、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以西方小说创作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小说，或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尺度来“格”中国小说之“义”，对说书艺术的偏见，不顾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以西框中以迎合西方读者的趣味等。正因为此，他提出了应当分析作者的学术背景与其所置身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来研究海外汉学家的著作的方法。

三十年来，在前辈学者如孙越生、李学勤、严绍璁等的带领下，海外汉学研究在知识论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的来说，作为一门学科的海外汉学研究实际上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许多的个案都还没有深入的探讨，更没有完全摸清各国汉学发展的谱系、学术流派的演变。方法论及汉学与中国近现代学术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很不够，因而我们至今尚不能清楚地知道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变迁以及学科体系的建立与海外汉学家的关系。反过来看，也很少有中国学者从汉学的角度切入中国近代学术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一种文化和学术的自觉，既不失自己的文化家园，又要以开放、宽容的姿态对待西方学术，因为海外汉学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当代学术的重建。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满足于成为一个海外汉学的一般译介者、转述者和表述者了，在获得历史的深度和国际视野的同时，我们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真正参与到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中去。以上的这些想法是西平教授一再提及的。

欧洲学术界有在教授过六十华诞时出版纪念论文集（Festschrift）的传统，尽管这有些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过我们作为西平教授晚辈的几位同事，还是决定用这种形式庆祝一下他的耳顺之年，以延续我们共同的事业。学术的用场在哪里？我觉得除了纯粹的研究功用之外，也应当成为侍奉生命诸阶段大事的手段。西平教授如今的治学，圆融通达，很少滞于情理而不能通贯之。晏几道曾曰：“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水分东西，终会再流到一处，这也许正是西平教授治学的旨趣吧。如今步入杖乡之年的西平教授，阅世既久，对东西方文化均能以平和与平等的心态兼收并蓄，将学问转化为人生，成为完美的整体，特别是他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和关怀，是大多数人所未曾达到的境界。我想此书的结集出版可以算作是对西平教授在上述四个领域取得重大贡献的一个纪念，也可以算作他学术生涯的重要一站吧！

在此，我代表我们三位编者向所有对文集予以支持的中外学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在编辑的过程中，汉学中心的硕士研究生全慧同学做了不少工作，外研社的编辑也费心颇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李雪涛

2008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海外汉学与汉学家研究】

- 严绍璁 提升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三个层面的思考 / 1
- 任大援 汲古得修绶 开源引万流
——关于新时期汉学的回顾与思考 / 13
- 顾 彬 有关卫礼贤的八个论点 / 32
- 京都静源 内藤湖南研究 / 40
- 朱政惠 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 / 67
- 李雪涛 误解的对话
——许理和教授汉学研究之理路初探 / 84

【传教士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

- 刘耘华 徐光启姻亲脉络中的上海天主教文人：
以孙元化、许乐善二家族为中心 / 94
- 石云里 吕凌峰 中“道”与西“器”
——以明清对西方交食推算术的
吸收为例 / 112
- 张 铠 利安当与“历狱”
——利安当所著《在华迫害纪实（1664—1666）》
一书简析 / 127
- 汤开建 刘清华 康熙时期艾若瑟出使罗马始末考察 / 168
- 金国平 “格尔墨斯”与“阿尔格尔墨斯”考辨 / 235
- 魏思齐 西方与中国相遇史：一位基督教学者的
若干回顾与思考 / 248
- 钱婉约 求知与冷漠的变奏
——晚明中国人的欧洲认识 / 277
- 沈国威 古城贞吉与《时务报》的“东文报译” / 295

- 李晟文** 民国时期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与徐州的教会学校 / 330
- 李福清** 与众不同的俄罗斯汉学研究 with 收藏家 K.A. 斯卡奇科夫 / 342

【国际汉语教育史】

- 内田庆市** 近代西人汉语（语法）研究史的
近况和课题 / 371
- 柳若梅** 18 世纪俄罗斯人关于中国语言学与教 / 378
- 朗宓谢 徐 艳** 战争时期的忠诚——罗伯聃
（1807—1846）的双重面具 / 405
- 顾 钧** 卫三畏与汉语学习工具书 / 426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

- 李文潮** 科里斯蒂安·科尔托特与莱布尼茨的
《中国自然神学论》 / 443
- 汉克杰** 越界者：尼采与李石岑 / 457
- 罗哲海** 张聪东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工作和
他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阐释 / 480
- 方旭东** 《论语》中的“仁”：有关英译的讨论 / 488
- 莫芝宜佳** 杨绛和西方文化：探险—苦难中的
安慰—转化 / 500
- 魏崇新** 中国古典小说的现代阐释——评夏志清的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 / 520

后记 / 532

人名索引 / 537

提升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三个层面的思考

严绍璁

对我们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正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性资料的编纂和整体性研究方面，以及在研究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方面，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这一学术研究在各国的运行状态。

这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意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作为世界文明的重大存在，对它的认知和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我们在“国际中国学”的研究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和经验，我国人文学者不仅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在不同的层面上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一极为丰厚的国际学术资源，而且以我们自身的智慧对广泛的国际研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或许可以说，这是三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也是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它从一个层面上显示了我国经典人文学术正在走向世界学术之林。

以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在相对广泛的学术层面中以理性的精神审视我们的学术业绩，提升我们的学术观念，调整我们的学术视角，规范我们的方法论，从而深化我们自己对于“国际中国学”这一学术的理解，或许是会有意义的。所以，我把自己思考中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之反思”作为议题，在三个层面中思考如何提升我们的学力，以继续提升我们的学术。

学术界常常喜欢使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来评价“国际中国学”的学术价值。从认识论的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但是，依据我个人粗浅的理解，把“国际中国学”定位为一种“学术性的工具”，而这样的“工具论”定位大多数又是建立在以对我国人文“特定学术价值”的“自我认定”为中心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这在事实上可能对“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的本体”，即对它的真正的“学术内涵”忽视了或失却了更有效的和更深刻的理解与相应的把握，由此而使我们的研究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阐释和表述中，有时就难免显得薄弱、片面、不到位、错位，甚至出现若干虚拟的幻影。

以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为例。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既有已经获得国内外学界定评的非常丰厚的业绩，也有急需静下心来深刻反思的层面。

把“日本中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工具”的认识，使我们失略了对“中国学”作为一门“跨文化”学科的“文化语境”的把握，因而也就对这一学科无论是作为“学派”群体，还是作为“学者”个人，在种种学术阐述背后支持这些学术观念的“文化语境”未能有足够的认知，也就未能进行相应的、恰当的研讨和评价，从而，就“日本中国学”而言，大多数的研讨，也就缺少了对内涵精神特征的解析。

一般说来，支持或促使“日本中国学”各种观念得以生成的“文化语境”，我个人以为有两个方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一种“文化语境”是，“日本中国学”它首先是“日本近代文化”构成中的一个层面，是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构筑起的“国民文化”的一种表述形态，它首先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类型。

比如，在我们习惯上称之为“东京学派”的内部，事实上存在着对“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阐述表现，而我们尚未对它